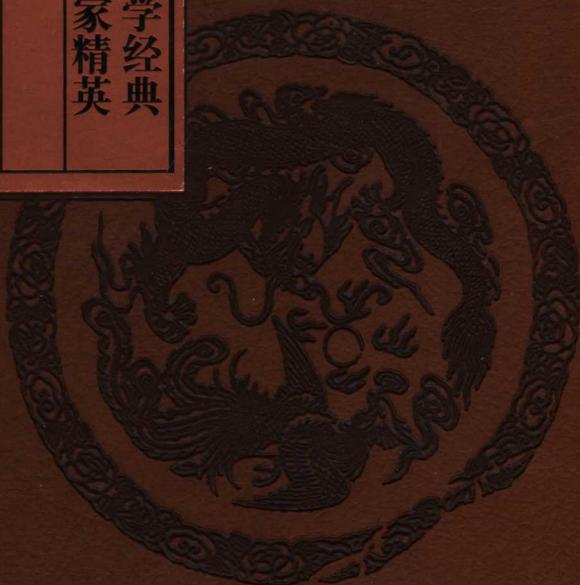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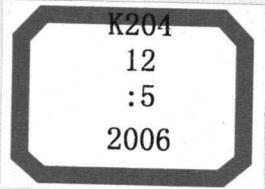
中国史学 名著评介

第五卷

仓修良主编

解读三千年史学经典
评析三千年史家精英





中国史学名著评介

第五卷

仓修良主编

解读三千年史学经典

评析三千年史家精英



总目

第一卷

- | | |
|-------|---------|
| 尚书 | 后汉书 |
| 春秋与左传 | 华阳国志 |
| 国语 | 宋书 |
| 战国策 | 南齐书 |
| 逸周书 | 魏书 |
| 世本 | 水经注 |
| 竹书纪年 | 十六国春秋 |
| 山海经 | 洛阳伽蓝记 |
| 越绝书 | 高僧传 |
| 史记 | 大唐创业起居注 |
| 列女传 | 梁书与陈书 |
| 汉书 | 北齐书 |
| 东观汉记 | 周书 |
| 汉纪 | 隋书 |
| 吴越春秋 | 晋书 |
| 风俗通义 | 南史与北史 |
| 三国志 | 大唐西域记 |
| 后汉纪 | 史通 |

总目



贞观政要
通典
元和郡县图志
明实录
国榷
罪惟录
明季北略与明季南略
读通鉴论
明史纪事本末
读史方舆纪要
明儒学案
宋元学案
绎史
明史

第二卷

唐会要
旧唐书与新唐书
旧五代史
新五代史
资治通鉴
通鉴外纪
唐鉴
东京梦华录
通志
续资治通鉴长编
容斋随笔
东都事略
三朝北盟会编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通鉴纪事本末
资治通鉴纲目
大金国志
文献通考
辽史
金史
宋史
蒙古秘史
元史
永乐大典
皇明资治通纪
弇山堂别集
藏书和续藏书

第三卷

四库全书总目
十七史商榷
廿二史考异
廿二史劄记
续资治通鉴
文史通义
史姓韵编
元史本证
考信录
畴人传及其续编
圣武记
海国图志
蒙古游牧记
碑传集(附续、补、三编)
夷氛闻记
朔方备乘
小腆纪年附考
中西纪事
明通鉴



- | | |
|----------------------|---------------|
| 湘军志 | 客家研究导论 |
| 东华录 | 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 |
| 新学伪经考 | 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 |
| 日本国志 | 明清史论著集刊及续编 |
| 元史译文证补 | 中国南洋交通史 |
| 宋史翼 |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
| 大同书 |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
| 中国古代史 | 历史哲学教程 |
| 中国历史教科书 | 秦汉史 |
| 历代舆地图 | 中国史纲(上古篇) |
| 清朝续文献通考 | 春秋史 |
| 蒙兀儿史记 | 中国通史简编 |
| 清史稿 | 中国近代史(上册) |
| 新元史 | 甲骨学商史论丛 |
| 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 |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
|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附《清代学术概论》) | 柳如是别传 |
| 古史新证 | 中国政治思想史 |
| 中国文化史 | 郑和 |
| 第四卷 | 岳飞传 |
| 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 | 清史探微 |
| 清代通史 | 中国古代社会史论 |
| 史学要论 | 中国思想通史 |
| 古史辨 | 中国历史大系·古代史 |
| 史讳举例 | ——殷代奴隶制社会史 |
| 通鉴胡注表微 | 民族与古代中国史 |
| 中国制度史 | 第五卷 |
|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 | 中西交通史 |
|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及其续编、 |
| 卜辞通纂 | 拾遗 |
| 晚明史籍考 | 战国史 |
| | 古代西域交通与法显印度巡礼 |



- | | |
|--------------------|------------|
| 隋唐史 | 辛亥革命史 |
|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 洪业论学集 |
| 汉书新证 | 古史论集 |
| 南诏国内的部族组成和奴隶
制度 | 中国史探研 |
| 明清农村社会经济 |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
| 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 穹庐集 |
| 清人文集别录 | 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 |
| 中国文献学 | 长水集及其续编 |
| 河山集 | 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 |
| 朱元璋传 | 太平天国史 |
| 明代的军屯 | 中国古代社会 |
| 明史考证 | 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 |
| 魏晋南北朝史 | 中国史学史论集 |
| 周代社会辨析 | 马可波罗在中国 |
| | 中华远古史 |



目 录

中西交通史	李东华	(1)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及其续编、拾遗	牟发松	(9)
战国史	李远涛	(32)
古代西域交通与法显印度巡礼	吴 煊	(52)
隋唐史	姜伯勤	(65)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荣新江	(75)
汉书新证	黄留珠	(83)
南诏国内的部族组成和奴隶制度	周伟洲	(99)
明清农村社会经济	杨国桢	(112)
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廖伯源	(125)
清人文集别录	周国林	(143)
中国文献学	顾志华	(157)
河山集	辛德勇	(169)
朱元璋传	苏双碧	(177)
明代的军屯	张金奎	
明史考证	张宪博	(193)
魏晋南北朝史	黄冕堂	(203)
周代社会辨析	张金龙	(225)
辛亥革命史	晁福林	(238)
	许小青	(250)



洪业论学集	王钟翰 (267)
古史论集	吕文郁 谢维扬 (279)
中国史探研	齐文颖 (292)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张书学 (309)
穹庐集	邱树森 (326)
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	郑志惠 (337)
长水集及其续编	葛剑雄 (352)
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	乔治忠 赵杨 (371)
太平天国史	茅家琦 (384)
中国古代社会	陈琳国 (397)
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	李尚英 (410)
中国史学史论集	吴怀祺 (424)
马可波罗在中国	李治安 谭晓玲 (439)
中华远古史	朱彦民 (450)

中西交通史

李东华



方豪先生在1953—1954年出版的《中西交通史》一书，迄今已逾半世纪，仍为中西交通史、中外关系史等相关领域中重要的通论性著作。

(一)

方豪（1910—1980），字杰人，浙江诸暨人，生于杭县，因以杭城为故里，自署杭县杰人方豪。方氏幼年家贫，四年小学毕业后无力升学，13岁入天主教预备修道院就读。次年续读杭州小修道院，学习国学、拉丁文及宗教科目，接受教士培成教育。1928年，小修院毕业，升读宁波圣保禄神哲学院（俗称大修道院），攻读哲学（两年）、神学（四年），旁及圣经、教律及教史等课程。1935年9月，在嘉兴晋铎。

方氏虽受天主教修道院教育，但自小钟情于中国文史，在修院中尝自习文史知识，并对天主教史产生兴趣，加以钻研。15岁时撰成《浙江天主教小史》初稿，为其早年自学之重要经历。1926年底，时为小修院修生的方氏，致函北京辅仁大学校长陈援庵（垣）先生，向其请教教史问题，并请求陈氏寄赠相关资料，从此展开他与陈氏二十余年鱼雁往返的师生情谊，因此方氏向以陈氏私淑弟子自居。

方氏晋铎后，在浙江地区传教三年，任杭州小修院国文教员及金



华地区本堂神父。同时，继续其天主教史的研究工作，完成《浙江外来宗教史》及《李我存研究》等论著，并博得声誉。1938年，方氏得天主教南京教区主教于斌（野声）之邀约，往战时大后方昆明，协助于主教复刊《益世报》，任副社长兼主笔。其后二年余，方豪服务于昆明及重庆《益世报》，除经常撰写社论外，并主编《宗教与文化》等周刊，结识留寓西南地区史学家甚多。张荫麟、向达（觉明）、白寿彝、方国瑜等诸中西交通史名家均结识于此时期。向达先生更以一己不通拉丁文及法文，尝对方氏云：“十六七世纪这一段历史（指中西交通史）交给你了。”对方氏鼓励甚大。

1941年初，方氏因从事新闻工作甚为忙碌，尤以志在研究历史，二年来竟无长篇之研究论文问世，因思摆脱报务，于2月23日向于斌主教辞职。辞职后，方氏静修于四川南充县本笃会修道院，潜心写作《中国宗教史·公教篇》。该院藏书甚丰，方氏获益匪浅。是年8月，方氏得浙江大学史地系（校长竺可桢、文学院院长梅光迪、系主任张其昀）之聘约，至贵州遵义浙大史地系担任不受薪教授。时方氏每学期仅担任一门课程，教授过中西交通史、元史等，因此有充裕的时间利用浙大丰富藏书从事研究工作。于浙大任教两年中，他发表了《拉丁文传入中国考》、《望远镜传入中国考——伽利略与科学输入我国之关系》、《徐霞客与西洋教士关系之探讨》、《十七八世纪来华西人对我国经籍之研究》及《明末清初旅华西人与士大夫之晋接》等重要论文，著述之勤奋为侪辈所少见。同时，方氏也担任重庆《益世报·文史副刊》主编，登载学术论著亦多。在浙大，他邂逅了张荫麟、谭其骧及缪钺等知名学者，建立了友谊，也增进了学问。

1943年8月，方氏为重庆复旦大学聘任为教授，除在史地系任教外，并教授拉丁文课程。复旦之聘约与浙大不同，为全职受薪教授，往后方氏遂以教学、研究工作为主业。在复旦，方氏与顾颉刚、邓广铭、鲁实先、胡厚宣等同事交往最多。1944年8月起曾兼任史地系主任一学期，后因车祸受伤而辞职。此一阶段，除继续发表论文外，并先后出版《中外文化交通史论丛》（第一辑）（重庆：独立出版社）、《中国天主教史论丛》（甲集）（重庆：商务印书馆）、《红楼梦新考》（重庆：独立出版社）及《外国史大纲》（重庆：正中书局）等书，著述宏富已堪当。

1945年8月抗战胜利。1946年春，方氏随复旦大学复员返沪，原拟继续复旦之教职，不意新任天主教北平教区总主教田耕莘枢机力邀方氏前往北平任职。方氏向往北京已久，在征得于斌总主教同意后，于是年7月至北平，出任天主教新设立的上智编译馆馆长职。该馆以编译外文资料、整理教中文文献，并向知识阶层传播教义为主要目标。方氏任职后，积极开展工作，馆中人力虽寡，但两年中编译出版图书二十种，尚有未出版之数十万字译稿。同时，创刊《上智编译馆馆刊》（双月刊）。馆刊内容以编辑、整理天主教相关文献及史料为主，前后共出刊三卷十三期，成绩斐然。方氏任职北平期间，曾考察明清之际利玛窦、徐光启谈道陈迹，摩挲教中前辈遗书、遗文，与私淑恩师辅仁大学校长陈援庵把晤，并应聘辅仁担任中西交通史课程。时辅仁历史系张亮尘（星烺）主任为研究中西交通史之前辈名家，特将其教授近二十年之中西交通史课程让予方氏，颇令方氏起敬。

1948年6月，北方形势逆转，田耕莘枢机主教离北平南下，方神父亦于两年约定服务期满后，南归上海，仍回江湾复旦大学任教。未及半年，江南局势亦告警。1949年初，方氏自荐于台湾大学新任校长傅斯年氏，得傅氏聘为历史系教授，年方四十的方氏遂于2月东渡台湾。方氏来台大后，教授中西交通史、宋史等课程，研究方向则转趋台湾史及宋史。来台初期，因台湾光复未久，既缺乏中文书籍，大学有关国学教科书也十分缺乏，张其昀担任教育部长后，遂编辑《国学基本知识丛书》，以优厚之稿费邀约学者编写各学科书籍。方氏应邀前后撰写了《中西交通史》（1953—1954）、《宋史》（1954）及《中国近代外交史》（第一册，1955）三书。对中国学术在台湾之重建，有深厚的贡献。

1950年，方氏来台后，有关中西交通史的研究，除持续过去有关天主教史之相关研究外，并拓展其研究领域于东南沿海地区对外交通（诸如对清康熙年间测绘琉球、台湾地图；宋代泉州等地之祈风问题；陈第《东蕃记》；郑和下西洋曾否到过台湾以及有关钓鱼岛归属之相关研究。充分显现方氏治史以其所居住地区为基点的深厚关联性）以及明清之际吕宋华人社会的相关问题（主要依赖50年代方氏曾多次赴欧美地区搜集的相关珍贵史料，对海外华人社会出版的华文传教资料等问题有先驱性的研究）。此外，1960年以后，方氏应天主教香港教区徐诚斌主教之约，在《公教报》上撰写《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专栏，



其后集结成《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三册，成为与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先后辉映的名著。

方豪治史，循民国史料学派精神（许冠三或称考据学派），始终孜孜不倦于“历史专题研究”之写作，甚少措意于通论性史著之写作。1942年张荫麟先生辞世，方氏有《略论张荫麟先生在史学上之成就》一文悼念张氏。文中方氏力陈“新中国通史之不易完成，史料之整理，要为一先待解决之问题”，因此对众人推崇之张氏《中国史纲·上古篇》一书，认为“余可断言，通史之作，绝非君成功之业”。他引用张氏对通史写作之看法，认为“通史之作，应先编成国史长篇，再从事通史之撰述，庶可望也”，以“彼自己所不愿认为得意之作，而他人谀之，可乎？”^①可见按方氏本意，他绝不可能如此早、如此匆促地从事中西交通史这门新兴学科的通史写作，但客观环境的压逼，使他在1953年到1954年，年方四十，各方资料尚未研究通彻之际，即从事通史性质中西交通史之著述，其不满意可以断言。他在《中西交通史·例言》中谓：“中西交通史范围甚广，作者才识，乌足语此！勉强从事，但求能借此获得读者之匡正，则万幸矣！”实为其上述立论之具体表达。但方氏晚年却谓：“这部书（《中西交通史》）如果能晚二十年著笔，自然将更为成熟，材料亦将更为丰富，但二十年前的勇气和体力，恐怕也不是二十年后的今天所能再希望获得的。”^②

（二）

① 该文载《书目季刊》13卷4期（1980年3月），第61~65页。藏而未刊垂四十年。

② 方豪《六十年来之中西交通史》，载《华学月刊》25期（1974年1月），第31~46页。

③ 见张维华《略论中西交通史的研究》，《山东大学文史哲双月刊》1983年第1期，第8页。

1953年至1954年，方豪应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之邀，撰成五册、七十万言的《中西交通史》。方豪此书，虽成于匆促之间，但亦有其利与不利的时空环境。按张维华先生看法，“中西交通史”学科名称之确立与体系之建立，要以1930年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及1934年向达《中西交通史》两书之问世为标志。^④1953年方豪撰写此书时，上距此一新兴学科之确立不过二十年，所能凭借之研究成果与范例极为有限。加以二十年间兵马倥偬，方豪转徙于杭州、嘉兴、金华、昆明、遵义、重庆、北平、上海、台北间，所收藏之资料，泰半失散，往昔得相与论学、切磋之学者，亦多留居大陆，请益无门；这些是不利的因素。但相对来说，方氏自就读修院时期，即研究中国天



主教史，1935年晋铎以后，研究更加精进，先后出版《中国天主教史论丛》（甲集）、《中外文化交通史论丛》（第一辑）及《方豪文录》（北平：上智编译馆，1948年）等三书，可以说是与此一新兴学科同步成长的学者。此外，方氏自1941年以来，在遵义浙大、重庆复旦、北平辅仁以及台北台大各大学历史系担任中西交通史之教授，累积十年以上的相关教学经验，教学相长，使其功力更形深厚。台大原为日据时代之台北帝国大学，原帝大教授藤田丰八、桑田六郎、岩生成一、小叶田淳均以东西交通史研究著称，故台大相关中西交通史资料之收藏极为丰富，方氏所见远溢于大陆时期。这些有利因素对方氏中西交通史的写作助益甚大。这是方氏这本巨著成书的重要背景。

就本书内容特色来说，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方氏已注意到“中西交通史”名称的局限性。在首章导言中，方氏明确指出：

以方位（西）做研究范围，本不妥适。如讲中国与阿拉伯、印度交通史，往往涉及南洋；谈中俄交通史，则又不能避免叙述中国与北方或东北方及西北方之关系……今日所以仍用此一名称者：一为国人沿用已久，一为教育部以此名订为大学科目之一。惟今日国人习用之“西”字，盖指欧洲或兼美洲而言。自明末以来，称“西学”“西教”“西士”“西画”“西乐”乃至“西医”“西药”等等，无不如此。清代中叶以后震于西力之东渐，几有谈“西”色变之势，至清末张之洞辈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于是“中西”二字之连用，乃尤为普遍……“西”字今日习惯用法，至此乃更确定为指欧美而言。顾就历史言：中国版图之疆界固随时代不同而有变迁，“西”字所指，更因历代地理知识的差别、国际之强弱及对外交通之发达与否，而或远或近，漫无标准，路上如此，海上亦然。如今日所谓“南洋”，明万历间尚称为“东西洋”，张燮因有《东西洋考》。足征方位之称，最难固定。

这是论“中西”一词之不适当，至于“交通”名称，方氏亦云：

“交通”二字之音译，当为 Relation 或 Intercourse，则采用“关系”二字，实较妥切。

结合前后两段论述，方氏实已提出“中西交通史”此一学科的名

称、范围及妥适性问题。即“中西”二字既无法涵括所有中国的涉外关系，“交通”二字尤不足以尽中国与外在世界交往的各个层面。事实上张星烺、向达于20世纪30年代正式使用此一名称时，他们指涉的范围也是有限度的。像张星烺编《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时，其方式系由远而近，先欧罗巴，最次印度。其理由是“今代外患，俱来自欧洲”。朱希祖的序更明言：

张君此书，固以阐中欧之文化，明相互之灌注，其主要
意旨在是，其他不过附庸而已。

可见张氏因懔于近代以来欧西文化之伟大，故名“中西交通史”，实际是以中欧交通史为最主要部分。至于向达之《中西交通史》，叙论中亦云：

这一本小小的书，只想将中国同欧洲诸国在政治文化方
面初步的交通情形，做一鸟瞰式的叙述。

与张氏观点如出一辙，即将中欧交通史视为中西交通史之骨干。这种观点显现他们心目中的中西交通史，系自鸦片战争以来，“西”力冲激，国人谈“西”色变，因而崇拜欧美及所谓“西洋”风气下的具体产物。或可勉强将中国与中亚、西亚以及印度的交通纳入，但绝不可能涵括中国传统与南洋、日本、韩国的关系。向达对此一缺点其实相当清楚，因此他同时有《中外交通史》（上海：商务，1933年）一书处理中西交通史所不及的“中国文化的东被与南传”部分，可见“中西”一词是有其局限性的。同样的“交通”一词固可以作最广义解，包括双方往来的一切方面，但如方氏所言，采用“关系”二字，更为妥切。因此，方氏虽然认为“中西交通史”为“约定俗成”的学科名称，但他的论述，已为晚近两岸学者将“中西交通史”正名为“中外关系史”铺陈了最佳的解释。

其次，方氏此书实为“中西交通史”领域最为完整的著作。所谓完整，系指此书不论在呈现中西交通史之全貌上，或就时间、领域、内容及深度上，皆较前人著述完善。就时间看，本书上起史前，下至清中叶，涵括整个中国历史时期（有关鸦片战争以后之历史，方氏另有《中国近代外交史》第一册一书）。就地域看，本书除重视中西交通史之主体内容——历代中国与欧亚大陆之迤西部分外，并兼及中国与东南亚（越南、缅甸、暹罗等）及南洋之交通。从内容看，方氏标举



中西交通史

民族迁移与移殖，凡相关血统、语言、习俗、宗教、神话、寓言、文字，甚至科学之交流、艺术之影响、著述之翻译、商货之交易、生物之移植、海陆空之特殊旅行以及和平之维系（使节之往还、条约之缔结等）与破坏（纠纷、争执与大小规模之战斗）等等，举凡中西自接触、交通（狭义）、贸易、文化交流、宗教、外交及移殖等过程，靡不包举，可谓包罗万象，兼及“交通”（应称“关系”）的各个层面。就深度言，本书除重视西方传入中国的思想、事物以及文化外，因方氏精通拉丁文、法文，对在华西教士及西方汉学家之研究较为熟悉，因而对中国文化之西传亦有深入的描述。故本书除由传统国人之立场角色着眼外，尚由西洋教士层面研究中西交通史的另一样态，是一本不折不扣的变向交通史。加以1949年后方氏定居台湾，广见台大日人所藏相关东西交通史之资料及研究成果，是故此书对西方及日人之研究介绍得特别详细。除个别研究成果之引述外，在第一章导言中甚至特辟专节叙述这两方面的情况，此所谓完整著作的另一特色。

再者，方豪为史料学派治史学者，长于“历史专题研究”的写作，因此《中西交通史》一书自始即特重一己专长领域的写作。“详人所略，略人所详”原则，随处可见。五册中竟有两册（四、五两册，近三十万言）内容是《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盖此一部分正系方氏研究专长之所在。写作方式亦是详密的专题研究写作方式，与一般通论性史著颇有不同。此一部分累积方氏中西交通史二十余年研究功力，并结合其在浙大、复旦、辅仁、台大四校之教学经验，内容最见精彩，也是其他同类著作难及之处。该书出版后，王德昭教授评论此部分说：

著者以其严格的历史学者之态度，故此书详于事实之考定，而少带叙论或率意解释之文字。然即以其对于事实之考定，著者使重要事实之历史意义，于此书中获得最确定之证明……征引史料之广博，考证之精密，与见解之高明，皆人所难能……此书为中国自有中西交通史著作以来用力最巨，内容最充实，并具卓越学术价值之巨著。^①

1984年日本京都同朋舍出版之《アジア历史研究入门》有关东西交通史概说，只列举向达《中西交通史》（上海，1934年）及方氏《中西交通史》两种，对方著之介绍云：

后者（方著）对相关学术各个方面介绍详尽，是研究者

^① 王德昭《方豪：〈中西交通史〉第四、五册》，原载《学术季刊》3卷2期（台北，1955年），收入方氏著《历史哲学与中西文化》，香港：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36～340页。



有用的手册书。^①

中外两篇书评，点出了方氏此书的成就与特点。但此书成于匆促之间，且因特殊的时空背景，亦有其无可避免的缺点。如全书中引用学者著作及意见处极多，但碍于当时两岸分隔对峙之现实，无法忠实引述学者名讳。又如，方氏十分坚持欧洲古代人名或地名，原均以拉丁文或各该国文字并写，但限于彼时印刷技术及水准，许多外文原名及音标，均无法照刻，或以他字（英文字母）代替，或省略原文。这些缺漏方氏生前即有说明（第一册例言）。其次，方氏此书秉持史料学派就史实论史事之精神，不骋空论，或贻考据之讥，但也充分反映民国时代史学研究的特色。前引方氏晚年所作《六十年来之中西交通史》一文，尝深情怀念往昔与他往来的中西交通史学者：

（民国）十五年至十六年一年中，受陈援庵先生恩泽最深，而二十五年张晓峰先生首先在《国风月刊》采用我的学步之作，以及三十年约我到浙大教授中西交通史，尤令人没齿难忘；向觉明先生把晤于昆明，竟以自己不谙拉丁文及法文，愿将十六七世纪一段中西交通史交我接棒，三十多年来，愧无以报其雅意。三十五年应北平辅仁之聘，张亮尘先生竟屈驾光临寄寓，以教授数十年之中西交通史一课相让，令人愧怍。张维华、白寿彝、郑鹤声、罗香林诸先生，曾时相讨论；李俨、岑仲勉二先生虽未一面，而书札往返，受益非浅。继李俨先生之后，严敦杰先生亦勤治西洋历算东传之学，来函提出问题亦最多……来台以后，斯学反觉寂寞，每念故人，不胜欷嘘！

就此段回忆看，说方氏《中西交通史》一书是总结民国中西交通史学界的整体成果，应不为过。此后，海峡两岸有关中西交通史之研究均陷入所谓“寂寞”时期。1980年方氏去世后，论者更谓台湾有关明末清初天主教传华史之研究“明显步入下坡，甚至出现断层”^②。庆幸的是1980年以后，大陆史学界受“改革开放”政策影响，从事中西文化交流史及中外关系史研究者日众，成果不断涌现。寄望大陆学者从新的观点、新的思维再出发之余，能秉持方氏扎实的研究态度，在方氏原有的基础上继续发扬光大，并期盼在不久的将来有新的中外关系史巨作出现。

^① 本田实信《东西交通》，《アジア歴史研究入门》5（京都：同朋舎，1984年），第599页。

^② 黄一农《明末清初天主教传华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新史学》7卷1期（台北，1996年3月），第143～144页。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及其续编、拾遗

牟发松

三联书店1955年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以下简称《论丛》),是中外史坛享有盛誉的唐长孺先生的成名作,也是我国出版的第一部以魏晋南北朝史为研究对象的个人论文集。全书共收入论文13篇,凡31万言,其中除1篇外均系初次刊布。1959年唐先生复在三联出版《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以下简称《续编》),收入论文8篇,约13万字,其中6篇初次发表。1983年在中华书局出版《魏晋南北朝史论丛拾遗》(以下简称《拾遗》),收入论文14篇,近20万字,其中12篇初次发表;“读史释词”8则,其中7则初次发表。三编所收43篇论作,内容上溯两汉,下及唐宋,但主要是针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所作的专题研究。据三编各书“跋语”可知,《拾遗》的问世虽较《论丛》初出已越28年,但所收论文“绝大部分是1958年至1963年间起草”,故三编论集,实际上是唐先生上世纪4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前期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所取得的三个阶段性的成果结集。

(一)

唐先生1911年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平望镇。1932年毕业于上海